

西藏吉林两虎被双开立案侦查

中纪委通报称两人妨碍组织审查,理想信念丧失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法制晚报等消息,30日上午,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称,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乐大克,吉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谷春立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另据报道,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分别对乐大克、谷春立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依法逮捕。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长期借用国企车辆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乐大克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中纪委的通报称,乐大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严重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严重违反生活纪律,进行钱色交易、权色交易。

谷春立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严重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用公款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收受礼金,为其妻经营活动谋取利

益,挥霍浪费公共财产,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长期借用国有企业车辆,接受公款宴请,多次出入私人会所。

二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财物问题涉嫌犯罪。

妨碍组织审查

记者注意到,中纪委对二人的通报中,均使用了“对抗组织审查”。记者梳理十八大后落马的官员中,“干扰、妨碍组织审查”者并不鲜见。

河北省原书记周本顺私存涉密材料违反工作纪律。其中,“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行为值得关注,除“进行非组织政治活动”外,还包括在重大问题上发表违背中央精神的言论,不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干扰、妨碍组织审查等。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规定,有干扰、妨碍组织审查行为的“可以依照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相应的行为包括:“强迫、唆使他人违纪违法”、“串供或者伪造、销毁、隐匿证据”、“阻止他人揭发检举、提供证据材料”、“包庇同案人员或者打击报复批评人、检举人、控告人、证人及其他人员”等。

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



长黄树贤也曾刊文强调,“干扰、妨碍组织审查和进行非组织活动,必须从严从重处理,体现党纪严于国法的要求。”

理想信念丧失

中纪委在通报中同时指出,乐大克和谷春立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且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

记者注意到,在中纪委对落马官员的处理决定通报中,今年至少8名落马的省部级老虎被点名“理想信念丧失”。

其中,10月16日,中纪委官网公布了国家安监总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杨栋梁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消息,称“杨栋梁身为中央委员,理想信念丧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且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特别严重”。另外,中央纪委监察部此前在通报中如此评价原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肖天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严重违纪,且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的开除党籍的部级干部之中,肖天第一个被评价“理想信念丧失”。



左图: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乐大克

右图:吉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谷春立

事件回放

今年8月1日,中纪委网站通报,吉林省副省长谷春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随同公布的简历显示,谷春立1957年出生,辽宁锦州人;在职研究生学历,科技哲学博士,高级经济师,于2013年起任吉林副省长。

今年6月26日,中纪委网站通报,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乐大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新华社客户端提供的简历显示,乐大克1960年3月出生,江西东乡人,博士研究生学历,2013年起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朴槿惠新传》

中央编译出版社 张俊杰/著



完

“我没有父母,没有丈夫,没有子女,国家是我唯一希望服务的对象。”她是韩国第一位得票率超过半数的总统——

好好地活下去

经过调查,嫌犯被证实是持有日本护照的间谍,受到朝鲜方面的指派进行暗杀活动。身为长女的朴槿惠没能陪母亲最后一程,这是她一生之中最大的遗憾。

回到青瓦台以后,朴槿惠看到母亲就像睡着了一样,安详地躺在会客厅。她心如刀绞,为了大韩民族,母亲就这样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每天凌晨,父亲都会哭灵,他轻轻地抚摸着棺木,目不转睛地看着母亲,毫无顾忌地失声痛哭着,不断喊着母亲的名字:“英修,英修啊……”听到父亲的哭声,朴槿惠肝肠寸断。每次从帷帐后走出来,父亲总是满脸泪水,随从侍卫们无不动容。

8月16日早上10点,青瓦台开放一般民众前来参加告别仪式。还不到9点,外面就来了一万多名市民,有被儿子背来的老奶奶、白发苍苍的老爷爷、刚刚学会走路的小朋友、穿着麻布衣的中年男女等,大家都向为人民尽心尽力的总统夫人告别。国外记者也非常关注这起暗杀事件,几乎每一个小时都会有一次报道。

1974年8月19日是母亲出殡的日子,出殡队伍将经过的那条路上,从凌晨就聚

满了人。上午,朴槿惠和弟妹进香之后整齐地站在灵前,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和母亲道别。灵车载着母亲缓缓向永诀殡仪馆驶去,父亲带着姐弟三人跟在车后面,每前进一步,朴槿惠的心都会痛得抽搐一下。在青瓦台门口,灵车短暂地停留了一下,父亲最后一次轻轻摸了摸灵车,向母亲告别。泪眼婆娑的父亲看着灵车渐渐消失,他转身走进母亲生前的办公室,所有的一切都安静地摆放在那里,但是深爱的妻子已经离开了,这一切让父亲痛不欲生。

母亲的告别式设在中央厅正门前广场,父亲独自留守青瓦台。朴槿惠清楚地记得当他们回到青瓦台的时候,父亲浑身颤抖地张开双臂紧紧地抱着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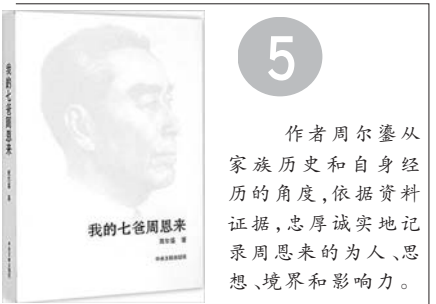
看着母亲在青瓦台留下的痕迹,朴槿惠的心像被刀凌迟般痛苦。母亲喜欢在自己的卧室放一张练习书法的桌子,空闲时间便会泼墨。但是在朴槿惠看来,这并不是母亲单纯的爱好,因为母亲每次遇到困难和烦心事时都会写字,像是要努力让自己的心绪重新平静起来。有时母亲在深夜也会在灯光下写字,那一定是她遇到了极大的考验,以至于深夜都无法安睡。母亲经常对朴槿惠说,很期待以后回到新堂洞的日子,即使住在小房子里,只要一家人其乐融融就是幸福。

但是现在,母亲已经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朴槿惠怎么也想不到会有一个黑洞洞的枪口残忍地对准母亲。她只活了49岁便孤独地离开了,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留下。每天早晨醒来,朴槿惠似乎都能看到母亲推门进来,穿着洗得干净的白色丝绸韩服,温柔地喊着“槿惠……”

母亲去世之后,朴槿惠像是被掏空了一样,食之无味,夜不安寝。在极度悲伤之下,她甚至出现了停经的现象,身体也开始到处疼痛,免疫力下降。这时,她才意识到悲伤除了摧毁人的意志以外,并不能给人们带来走出困境的力量,如果父亲看到自己的样子会更加痛心。她决定振作起来,好好地活下去,让忙碌赶走自己内心的悲伤。

《我的七爸周恩来》

中央文献出版社 周尔璞/著



5

作者周尔璞从家族历史和自身经历的角度,依据资料证据,忠厚诚实地记录周恩来的为人、思想、境界和影响力。

令人毛骨悚然

第一次谈话时间很长,而且分两次进行。主要汇报1949年刘、邓大军进军西南时,我作为中学生入伍后,随军参加了从武汉直到四川、西康地区的解放斗争。首先汇报我经过湘西、川东、贵州边境等俗称“三不管”地区的所见所闻。

这个地区以苗族为代表,“吉首”是首府,汉族人口不少,还有土家族等等。湘西地区山清水秀,湿度比较大,当地农民种植水稻不少,丘陵地区也种植了玉米(当地人称“苞谷”),川东和贵州边境比较荒凉,普遍种植玉米。在这个“三不管”地区,到处是起伏不平的丘陵甚至也有峭壁千仞的高山。在历朝历代中,其复杂的山林地,使当时政府的行政管理力所难及。有些土匪、杂牌军和当地的豪绅恶霸在那里占山为王,各据一方。不法之徒到处流窜,外来派驻的力量很难在当地开展“清剿安抚”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这地区首先要通过“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土地改革运动,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新生政权才能得以建立和牢固。当时苗族和汉族的贫寒群众到处可见,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有些赤贫的妇女甚至裸体抱着小孩,站在公路旁,等候路过的解放军解衣相赠。

我们的普通战士,除了身着一套军服,身背沉重的枪弹、米袋,此外别无他物。许多解放军战士只有一件棉上衣,在行军途中反着穿,当经过城镇的时候,再正过来,使衣服的正面看上去比较清洁,向群众示以整齐清洁的形象。在这种情况下,当战士们看到贫苦的苗族群众惨不忍睹,但又没有多余的衣物可以捐赠,为此感到发窘,只能飞报上级以求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当地有些苗汉群众,由于世代杂居在一起,甚至容貌和语言都难以区分。

由于党和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有广泛的良好声誉,当地人民除有时无意中传播一些敌人恶意散播的谣言以外,更为广泛流传的还是关于解放军优良作风的故事,以及党的各种政策方针,特别是比较深入人心的土改政策。由于这些地区地形复杂,许多土匪、杂牌军队,少数民族的不良武装分子,四处盘踞。群众向我们军队和工作人员靠拢还是有顾虑的,甚至要冒被杀害的危险。晚间,在崇山峻岭间可见点点的鬼火似的灯笼,有时还可看见不法之徒持枪蠢蠢欲动。山谷众多的地区,每有阵雷,或马鞭抽击声,便可声闻数里,震耳欲聋。深夜时,狼嚎的回声好似千百妇女因有不幸的遭遇而失声痛哭,令人毛骨悚然。

以后我又接受任务,只带了一个排的军人,“押”着五个县至少七百人的劳改犯,到马边、峨边等原始森林山区去,抢运因山区交通不便而在那里积存的玉米等杂粮,以保证军队和城市的供应。

当时,因为担心枪支被抢或遗失在山谷丛林中被坏人利用造成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出发时决定留下枪支。但怎么管理这数百人的劳改犯呢?那时候,我只有二十出头,初生牛犊不怕虎,没二话就出发了。但我也想了个办法来管理这些犯人。我按照班排建制,挑选出犯罪较轻、态度较好、文化较高的人,让他们当班排长,实行自我管理。我坚持给他们训话,表扬好的,批评差的。一开始,我讲话时,开口就说“同志们”,后来发现不对,才改口称“积极分子们”。之后我向总理汇报,讲到这些情景时,他也笑了。